

烟台故事

山东汉子砌硬墙

王锦远

在昆嵛山的深处，牟平磨王格庄村就像一块被岁月磨旧的青石板，窝在鹰嘴石的东边。从明朝初年起，王家祖辈就在这儿扎根，跟青石打起了交道，锤起锤落，一片片磨盘从这里发往胶东各地。他们压根没有想到，在日后的岁月里，能跟北京、跟人民大会堂扯上关系。

时光流转至1958年8月，蝉鸣裹挟着灼热的暑气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澎湃热潮中。就在此时，磨王格庄的十一位石匠响应上级的号召，背起钢锤和凿刀，踏上了进京之路。他们或许还不知道，自己即将参与的工程，将在天安门广场勾勒出新中国最恢弘的建筑弧线——人民大会堂的花岗岩墙体，正翘首等待着这群山东石匠的凿刀。

罗福佑对那段岁月的记忆，永远定格在脚手架上的月光里。时年二十七岁的他，手持錾子，在三吨重的花岗岩上凿出第一道墨线。“云南石匠雕廊柱，咱山东汉子砌硬墙。”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掌在石材上轻轻敲击，以石匠独有的测量术判断平整度：声音清亮，便知石材达标；若闻闷响，则需再凿三锤。

二百多个日夜，他们把每块石头的误差都控制在0.1毫米。墙缝严得插不进刀片，连苏联专家都说：“中国石匠的手就是标准的水平仪。”来年5月他们从首都返回家乡，除了大红的奖状，还带回了11套簇新的绿军装。

这手艺不是凭空来的，磨王格庄人祖祖辈辈与石头打交道。北山上的采石场，断壁上至今还留着斧凿印子。鼎盛时，村里三百多名石匠同时开工，锤声在山谷里撞出道道的回音，犹如威武雄壮的交响乐，连天上的云彩都不忍离去。他们打出的磨盘一度曾卖到烟台、福山、文登、乳山，大半个胶东半岛都曾用过他们的活计。村里的男孩子十岁就开始学握凿，十五岁就能独自采石，磨盘的十几道工序，早就刻进了骨头里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片片的磨盘，村子便得了个名字——磨王格庄。

磨盘的精妙之处，集中体现在磨眼的设计上。上基(片)磨盘凿有“一大一小”双孔，直径4厘米的小孔，是粮食研磨的第一道入口；直径8厘米的大孔，则是研磨成粉的第二道入口。两孔的设计，不仅可以有序地控制磨粮的节律、提高研磨的功效，而且还可以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，较好地解决研磨时粮食的壅塞和回流。上下磨盘每基(片)八铺(组)七十二齿呈放射状排列，每盘齿纹倾斜约45度，这是历经六百多年摸索得出来的黄金角度。在这样的设计下，粮食从磨眼滑落，会被长齿匀速导入每条短齿，每片磨盘上8个“扇形加工区”能让小麦三遍成粉。老石匠王芝明更是身怀“听音凿齿”的绝技，仅凭锤凿相击的声音，便能判断齿深是否均匀。他打造的磨盘，使用起来省力三成，出粉率还能提高五个百分

点。这些凝聚着智慧与匠心的技艺，不仅支撑起村民的日常生活，更为他们承接大型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烟台化工厂硫酸塔的订单，让山村迎来短暂的回光返照。近百个用青石凿成的圆槽，每个40多元的加工费，让村里第一次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声。然而，面粉机的轰鸣很快便淹没了石匠的锤声。1985年，随着最后一锤落下，曾经兴盛的石匠产业走向衰落。但石匠们的智慧与技艺，并未完全消逝。

村中央有两座石桥，是罗福佑1957年设计的。一座圆拱的叫太阳桥，一座箭头形的平顶桥原叫星光桥，现在叫喜旺桥。桥面全是楔形青石咬在一起，没使一斤水泥，到现在还结结实实。太阳桥心石上的红五星，风吹雨打这么多年，还看得一清二楚。有一年市里的一位工程师得知此桥后，曾特意驱车前来桥下，趴在桥底测量，他发现每块石头的受力面都是精准的抛物线，不由地感叹道：“这是拿锤子算出来的力学公式啊。”这些石桥，既是石匠技艺的见证，也承载着村民们对往昔的回忆。

磨王格庄村能有“磨王”的名号，不光靠乡亲们的勤劳和手巧，北山上那条千米长的“青龙白虎”石线也起了大作用——青石和花岗岩交错在一起。如今再看这条石线，早已是坑坑洼洼，青石层被凿得像蜂窝一样，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最后一批石匠中，只有周义成留在烟台石料厂，直到临终前，嘴里还念叨着“想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一看”。这份对石匠事业的执着与牵挂，令人动容。

去年秋末，文物贩子开着皮卡闯进山村，用十几元的低价，将村中残留的百余片磨盘全部收走。王可治老人抚摸着磨眼，叹息道：“他们不知道，这小孔里曾装着整个秋天的麦香。”

夕阳为鹰嘴石镀上金边，那道被敲掉的鹰嘴尖，仿佛是时光留下的缺口。南方人或许认为这破坏了风水，却不知正是这看似“破坏”，让磨王格庄的名字，永远镌刻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里。

如今，机械臂在村头的石材厂切割出完美的弧线，而磨王格庄的石匠们却坐在墙根下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。他们很少再谈论当年的锤法，只是偶尔瞥见电视里闪过的人民大会堂镜头时，浑浊的眼睛里，会突然亮起如錾子撞击石材般的火花。

当双磨眼、八铺齿、干缝墙的传说逐渐模糊在凿刀与石屑的交响里，那些被岁月反复摩挲的技艺，终将随着最后一方磨盘的裂痕沉入时光的河底。但磨王格庄石匠的手泽并未埋灭——他们掌心的温度早已嵌进人民大会堂的石壁，让每一道冷硬的大理石纹路都成为会呼吸的年轮，在穿堂而过的风里，低声翻涌着永不风化的传奇。

(致谢王可治、李元伦、刘坤亭等先生提供相关信息)

往事如昨

马刺

王吉永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在烟台三中读书的时候，班主任经常换，一任班主任就干一学期，再开学就换老师了。三年中担任班主任时间最长的，莫过于袁老师了。袁老师是教我们平面几何课的老师，她整整给我们当了两学期的班主任。袁老师平日挺和气，总是笑盈盈的。她从来不批评我们，但她用另一种方式照样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

我爱看课外书在班上是出了名的，虽然爱看书，但因生活困难，手里没钱，自己从来没买过一本课外书，全是向有书的同学借的。既然是借的，就要懂得借书的规矩，除了保护书的整洁无损外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信守诺言按时奉还。为此，我总是把时间利用到极限。

初二上学期期末考试前，大家都集中精力复习准备考试，看课外书的人少了，课外书相对也好借一些。我自以为平日学习基础好，课外书照看不误。复习期间，我借到一本长篇小说《风雪儿女》，书中内容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，鲁西南人民协助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、消灭还乡团的故事。书中情节离奇曲折、扣人心弦，就差30多页就看完了，实在难以停下，只能上课看了。

可是下一节课是袁老师的平面几何课，我自作聪明，提前用一张旧报纸给小说包了个书皮，上面用大字写上《平面几何复习题》，然后又离开我第一排的座位，坐到后排的空位上，前面被高个同学挡着。趁袁老师正在专心致志地给同学们讲例题，我在后面偷偷看起课外书。正当我被故事情节感动得如痴如醉的时候，袁老师突然出现在我身旁。她把书拿去后，一把就把书皮撕掉，这一下显出了庐山真面目。袁老师把书举起来，对全班同学讲：咱们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，你看王吉永同学还有心思看《风雪儿女》！袁老师故意把《风雪儿女》说成《风雪女儿》。全班同学的眼睛像无数只探照灯一起聚光射向我，弄得我满面通红、无地自容。下课后，袁老师把书还给我了，并说：老师不反对你看课外书，但你不应该上课看。现在正是期末复习的关键时刻，班上同学哪有看课外书的？袁老师话不多，但像妈妈对儿女的关心，让我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。上课看课外书这件事，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。

二

我读初中那段时间，劳动课特别多，每学期都要下乡助农，特别是到麦收季节我们吃住都在农村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西陌堂村割小麦，每个人把着一垄小麦(5行)割，这个活开始没觉得怎么累，可是时间一久就觉得，腿蹲时间长了也疼，腰弯久了也直不起来。

农村干活的规矩是早晨先到地里干活，大约干两个小时后回来吃早饭。一袋烟的工夫上工的钟声就响了，再上山干一上午，中间休息一次，晌天后回来吃午饭。饭后打一个盹的工夫再上山干一下午，中间也是休息一次，傍晚回来吃晚饭。晚饭后稍事休息就要上山打夜班割麦子了。只见村里的4盏大

汽灯早已点亮，分别固定在麦田四周的杆子上，把麦田照得像白昼一样。一直干到很晚才回去休息，同学们每人手上都磨出水泡，个个累得精疲力尽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上山的钟声敲响后，袁老师见还缺10个男同学。这10个男同学单住在农民闲置的小厢房里，地上铺了些苞米秸子，上面再铺上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，大家就睡在上面。袁老师去拍门，没有声音，喊他们名字也没有回应，可袁老师明明听见屋内有说话声，还听到男同学们约定，谁都不准给袁老师开门。袁老师索性不走了，就等在小厢房门口。一会儿，几个男同学让尿憋得不得不开门了。袁老师把男同学都叫出来，说：我还以为你们跟着孙悟空去取经了呢，原来都在屋里。老师知道同学们都很累，可是若不抢着把小麦收到家，一旦天下起雨来，小麦还在地里，被雨淋了就会发芽降低质量，甚至霉烂。接着袁老师把她的手伸给同学们看，同学们看了袁老师的手后都想哭，只见袁老师两只手都是水泡，水泡已经磨破了，包手的纱布都黏在手上。几个男同学扶着袁老师，继续上山割小麦。

三

1958年，学校要新盖一所新教学楼——西大楼。为了节约开支，学校采取勤工俭学的办法，高中生挖土方，初中生去张家窑(当时的烟台砖瓦厂，位于现南山公园人工湖处)拉砖。我们三个人一辆大板车，袁老师说拉完砖后可以自由活动。

我和其他两位男同学是从南道(即现在的环山路)拉着砖回学校的。南道虽然不如北道(大海阳路)好走，但比北道近了好多。回来时已是下午了，我们又累又饿又渴，走到轴承厂门前，见地里有萝卜，经不住诱惑，我们拔了一个，分成三份，每人吃了一小块。吃完萝卜后，把砖拉到学校，卸在工地上。见走北道的同学还没回校，我们三人就地一坐，下起了五子棋，我不会下棋，只能当观众。

正当我们下得起劲的时候，我见袁老师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三人走来。我高兴地告诉他俩，袁老师看咱们比其他同学回校早，准是来表扬咱们的。这时袁老师已走到我们面前，笑着说：你们干起活来生龙活虎的，怎么这么早就完成任务了？我们刚要答话，袁老师接着又说：你们回校之前还偷过人家萝卜吗？我偷看了一眼袁老师的表情，与来时截然不同，态度很严肃。我立马站起来，他俩也站了起来。我首先承认错误，保证以后永远不犯这类错误了，他俩也简短地承认了错误。袁老师接着说：你们能认识到错误，我就不批评你们了。不过我只能原谅你们这一次，下不为例！

班上同学有时在背后也议论过袁老师，说袁老师就爱讽刺学生。我想起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曾看过一本书，名字叫《骑士与马刺的故事》，说的道理是，骑士之所以用马刺，并非是要给马造成伤害或凌虐，而是让马奔跑得更快，并且当马在路口处迷茫的时候，给马提示应该向左或向右的正确奔跑方向。袁老师的所谓“讽刺”，不正是“骑士与马刺”的写照吗？